《廣東省城俗語解》：幕末日本粵語文本接觸與閱讀的個案研究

孫楊洋

提要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藏有《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一冊，此前研究推測其或為天保弘化年間日本人所作的粵語研究書。然經與十九世紀歐文資料比照，可知其實覆寫自在廣州的傳教士撒繆爾・邦尼編纂的、英粵對照例句集《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1854）。《詞彙集》或於出版後不久，便作為最新的英語學習資料，經由傳教士羅存德進入日人視野。而透過該寫本中大量留存的閱讀痕跡，能夠窺知其閱讀者（施訓者）解讀粵語白話文的方式及策略。閱讀者將已有的漢文訓讀經驗與知識遷移至粵語白話文解讀中，甚至可能還運用荷蘭文知識輔助解讀英文單詞、進一步解讀難懂的方言字，同時以之反哺其英文的學習。基於以上觀察、並結合史料，推測其閱讀者為幕末蘭學向英學轉向背景下、積極於新學問者之一員。幕末日本知識人與較陌生的語言文本初步接觸時，表現的困惑與所作的努力，於此一例中得以窺見。

關鍵詞　《廣東省城俗語解》，《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粵語白話文，訓讀

1．引言：《廣東省城俗語解》的再發現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Mita Media Center）現存寫本《廣東省城俗語解》一種（一冊、四十九葉，索書號：68@20@1、以下簡稱「俗語解」）[1]。其正文部分收錄以粵語白話文（以下為避免行文混亂，略稱「粵文」）書寫的粵語單字、片語、短句等，共 5,000 餘條。幾乎所有片語及短句上都施有用於漢文訓讀的返點、送假名等，例如「我都係二咁上-下一」（1a，我也差不多這樣）[2]。此外，還零星見有朱筆書寫的英文或英文的片假名轉寫，如「鐵」左側有朱筆「iron」（22b）、「筆」右側有朱筆「ペン（pen）」（30a）。

魚返善雄（1943:18-19）曾提及有一題為「廣東省城俗語解」（一册四十九葉）的寫本，其文中所記述的特徵（如有訓點、英文等）與慶應所藏的該《俗語解》寫本完全契合。魚返文亦提及其中有訓點及英文。所舉訓點諸例，如「呢-箇ノ圖我寄セ二去ル花-旗-國ニ一」（26a，這幅地圖我寄去美國）、「鴉-片ハ係二毒-物一」（31a），皆與慶應此寫本中的訓點完全一致。要之，魚返所見極有可能即為此慶應藏《俗語解》寫本[3]。

但魚返（1943）未提及《俗語解》寫本所在，使得此前的學者只能從其介紹中窺知一二，而無法目寓其書來檢證魚返的推斷。例如，關於此寫本的成立時期，魚返稱「内容から推察して恐らく天保、弘化の頃、卽ち阿片戰爭前後のものと思はれます（從內容推斷，所屬年代很可能是天保、弘化年間（1830–1848），即鴉片戰爭前後）」。如中嶋（1995:65）敷衍魚返之說，以天保弘化時代成書的《廣東省城俗語解》為日本人粵語研究史上最早的著作[4]。

---

[1] Google 圖書開放線上閱覽（慶應義塾大學 2010 年 8 月 10 日數位化、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id=cJxGZDvLgKkC&hl=zh-TW&source=gbs_navlinks_s

[2] 本文引用線裝刊本及寫本時使用類似「1a」的形式表記，其中數字代表葉數、a/b 代表右／左葉。引用粵文部分，若必要則在葉數後以通用語譯附於後。又當《俗語解》中訓讀所表示的意思明確與原句的意義相左時，則在原句譯文後再附上其訓讀結果的通用語譯文。

[3] 亦有其中一本為以另一本為底本（或兩本皆是以某一本為底本）的本文、訓點等全部相同的傳寫本之可能性無法排除。然筆者所見，未有其他同名寫本存世，其可能性或較低。

[4] 此外，又如天理大學中國學科研究室（1952:25）收錄此書為所藏不明的天保弘化時代鈔本。

然而，筆者閱讀此次再發現的《俗語解》時，卻對舊說產生了疑問。書中記錄了一些例如「多謝你計錢啥嘭唭」（1b，謝謝你把錢都算好了）等十足道地的粵語表達。此外，書中還收錄了諸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9b）、「耶穌教人保守靈魂」（36b）等基督教相關的語句。天保弘化時代，日本仍在禁教期、與世界的接觸亦尚不頻繁，日人何以能夠撰寫出這些粵文語句？抱持著以上疑問，筆者將之與片岡、李（2022）附錄中所列的近代傳教士粵語文獻相比照，發現《俗語解》並非是日本人原創的粵語例句集，而僅是將撒繆爾・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的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1854，「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以下簡稱「詞彙集」）一書中漢字部分抄出而成的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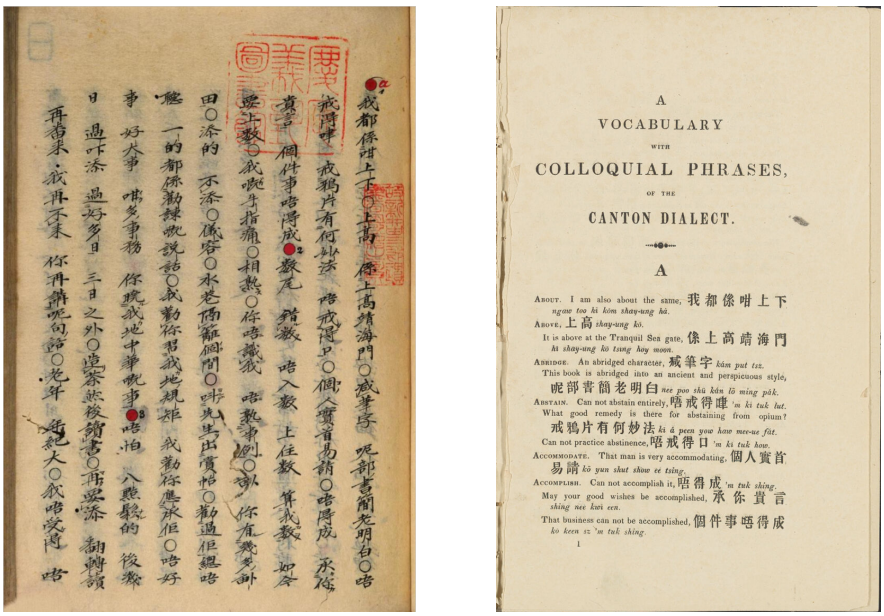

圖 1　左：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藏《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1a，請求記號：68@20@1）
右：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p.1）[5]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寫本《俗語解》成立年代不應當早於 1854 年。如此，不僅其製作的年代、生成的歷史背景皆需要重新考察，又由於其底本的發現，圍繞從《詞彙集》到《俗語解》的整個過程，都產生了更多需要解決的疑問。例如，《詞彙集》究竟如何得以進入日本？又如何轉化成寫本《俗語解》？《俗語解》中的訓點作於何時？又為何人所作？諸如上述的問題都有待考論。

以下，本文將透過文獻的發掘，重新梳理從《詞彙集》到《俗語解》文本生成與轉化的經緯，注意牽扯於過程前後的編纂者、傳播者、接收者。其後，將著重於閱讀者（施訓者）的行為，透析《俗語解》寫本中留下的種種閱讀痕跡，窺探其閱讀時所調動的知識與經驗，以探索其可能的身份。

2.《廣州方言詞彙集附俗語片語》的成立與流播

2.1　原點：邦尼與《詞彙集》的成立

關於《詞彙集》，除竹越（2013:14）及片岡、李（2022:136）等早期粵語文獻目錄中有提及書名外，筆者並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以下，依據筆者所作的調查，對其成書經過及正文

[5] 哈佛燕京圖書館本開放線上閱覽（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為筆者所見可線上閱覽的文本中圖像最清晰者：https://curiosity.lib.harvard.edu/chinese-rare-books/catalog/49-990058287770203941

內容作一概略的介紹。

撒繆爾・邦尼（1815–1864）[6]，自 1846 年作為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傳教士抵達廣州周邊後，輾轉居住於河南、黃埔（今廣州市海珠區、黃浦區）一帶。《詞彙集》中的例句，大多來源於其本身 19 世紀 40 至 50 年代在廣州傳教、生活的記錄[7]。除了前節所舉抄錄在《俗語解》中的基督教相關語句外，還有「三水縣西南鄉（今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整好豆乾」（p.9）、「南海縣（今佛山市南海區）唔敢得佢」（p.31）、「我住家河南番（翻）過河做手作」（p.108）等廣州一帶的在地資訊。

1854 年，原在廣州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隨培里（Matthew Perry, 1794–1858）的艦隊前往日本，邦尼臨時接替衛三畏管理美部會在廣州的印刷所。《詞彙集》或是以此為契機得以梓行。

在《詞彙集》出版之前，邦尼編纂有另一本粵英對照例句集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1853，「廣州俗語片語」，出版機構不詳）。與邦尼幾乎活躍於同一時期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邦尼傳記最後所附著作目錄中僅錄《廣州俗語片語》，然附言「A second edition was printed（已有第二版印行）」（Wylie 1867:151），是知《詞彙集》可能當時是作為《廣州俗語片語》的「第二版」問世的。對比例句部分，可以發現《詞彙集》中收錄的例句確實大多來自於《廣州俗語片語》之中。

而兩書的編排方式則截然不同，《廣州俗語片語》中僅收錄粵文例句與對應的英文譯文，而無羅馬字表記的粵語讀音。卷首先羅列單詞，其後羅列例句。例句整體按照例句的漢字數以及其所對應的英文譯文中單詞的長度排列。而 1854 年作為再版問世的《詞彙集》正文部分則與之相異，其以英文單詞為詞目，詞目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若詞目有直接對應的粵語詞，則在其後附上漢字。其下，出列英文例句及對應的粵文、粵語音（使用邦尼自己創製的羅馬化方案）。例如，在 1854 年的《詞彙集》首頁所見「above（在某物之上）」一詞及其所對應的例句為：

> ABOVE，上高 *shay-ung kō*.
> It is above at the Tranquil Sea gate，係上高靖海門 *hī shay-ung kō tsing hoy moon*.(p.1)

而在 1853 年的《廣州俗語片語》中，作為單字的「上高」被收錄在卷首（p.12）的單詞列表中，例句「係上高靖海門」則列於「六個漢字」之「句中所有單詞都在二音節以下」的部分（p.62）。由此可見，原本檢索例句困難、欠缺實用性的例句集《廣州俗語片語》，在作為《詞彙集》重新出版時，則被改編為了更方便英語使用者檢索的工具書。

2.2 舶來：《詞彙集》傳入日本始末

2.2.1 古賀謹一郎的記錄

《詞彙集》被帶到日本的時間，或許與付梓的時間相隔不久。1855 年 1 月，德國禮賢會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作為漢語與英、荷語的翻譯，隨同美國艦隊抵達日本下田。1854 年春夏，培里艦隊與江戶幕府締結了《日米和親條約》及《下田追加條約》兩份文書，艦隊此行是為處理批準書換文的相關事務（「第三次日本遠征」）[8]。

---

[6] 關於邦尼生平，筆者僅見偉烈亞力所作傳記（Wylie1867:149-151）的記錄，未見其他文獻佐證。又偉烈亞力稱其漢名為「啷呢」，亦僅見此一文獻記錄，實際使用與否不明。《詞彙集》收錄「My surname is Pawng, 姓龐嘅」（p.134）一條例句，或許暗示邦尼另有龐姓漢名。

[7] 嚴格而言，魚返（1943）的推測並非完全錯誤，其記載的內容確實成立於鴉片戰爭前後。

[8] 羅存德跟隨培里艦隊遠征前後的經歷，可參看那須（1998）。

在條約審議事務之外，羅存德以個人名義向日本方面的負責官員贈與了一些書籍[9]。其中的細目不得而知。已知的有兩種羅存德贈與蘭學者堀達之助（1823–1894，時在下田）的書籍，分別為藏於靜岡縣立中央圖書館葵文庫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英國公理會傳教士）《漢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42–1843）二冊，以及藏於市立函館圖書館的麥都思《英漢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二冊（那須 1998:101、遠藤 1999:43-44）。

羅存德的到來，也引起了蘭學者古賀謹一郎（1816–1884）的興趣。1 月 26 日，羅存德入港之後不久，當時在下田處理俄國相關事務、擔任露西亞應接掛的謹一郎便得以與羅存德會面。謹一郎在日記《西使續記》中記錄了兩人間的問答，評價「火船譯士杜乙（德意志）產，漢名羅存德，其人慧猾」[10]。在簽訂《日露和親條約》後不久的 2 月 5 日，謹一郎來到臨時奉行所確認羅存德所進呈的書籍。他在日記中記載：

> 吾差務竣，為閑人……遂至假衙（臨時奉行所）。見兩鎮（伊澤美作守政義、都筑駿河守峯重），告公命同事。伊鎮出示羅存德所呈地圖、語法書、《廣城俗語解》等……聞存德言「近日英佛將來。英强悍，宜用意待遇。吾所呈英語法，宜細講。」[11]

日記中所列的羅存德贈呈書目中，特別提及有《廣城俗語解》一種。近代傳入日本的洋書，若非原本附有漢字書名，則在日本文書中的稱呼往往未必固定，即使名稱極其類似也未必可作同書而論。「俗語解」作為禪語錄、俗語方言辭書的書名，在江戶時代並非稀見，例如唐話辭書中便有《俗語解》（江戶中期）一種。確實《詞彙集》作為漢語方言詞彙集類的圖書，翻譯成「俗語解」有其可能性。然而，謹一郎並未詳述《廣城俗語解》的內容；又據筆者所調查，現存於日本的《詞彙集》中亦無江戶時代傳來者。《廣城俗語解》是否即《詞彙集》，實難斷言。

然有以下兩點事實值得注意：其一，依據片岡、李（2022）所附晚清傳教士所編纂的粵語文獻目錄，出版於安政以前者僅有馬理遜《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題名相似；然《廣東省土話字彙》扉頁題有漢字書名，應不至於略作「廣城俗語解」。其二，原題中的「colloquial」一詞在《詞彙集》中作為詞條收錄，對應粵文譯作「俗話」，例句中則對應「俗語」（p.29）。而就筆者所見，1855 年之前問世的粵語相關文獻中無收錄「colloquial」一詞者（如下述《廣東土話字彙》、《廣東方言中文文選》等中皆未見收錄）。綜之，「廣城俗語解」作為《詞彙集》的臨時譯名、此處所言《廣城俗語解》即為《詞彙集》的蓋然性相對而言更大[12]。

---

[9] 這點除下文所舉堀達之助舊藏辭書與下文所引古賀謹一郎的記載外，還可從〈（安政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5 年 2 月 4 日）長樂寺對話書〉中記載的「先日は書籍類被贈忝、（中略）美作守差圖にて、遣候箱類江、ロツフシヤイト横文字確認居（前日拜受書籍之類（中略）按美作守（伊澤政義）指示，其所贈呈的箱上確認有西文 Lobscheid）。」（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1916:374）一則得到印證。

[10] 《露西亞應接掛古賀謹一郎增西使續記》安政元年十二月十三日（1855 年 1 月 26 日）條記載（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1913:373）。

[11] 《露西亞應接掛古賀謹一郎增西使續記》安政元年十二月廿三（1855 年 2 月 5 日）條（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1913:383），括號內為筆者所加注釋。除了《西使續記》之外，謹一郎同時還有簡略的個人備忘錄性質的日記《謹堂日誌》。現存斯道文庫濱野文庫的《謹堂日誌鈔》（索書號：ハ 09-4-68-1）留存儘管覆蓋弘化四年至安政三年（1847–1856）的部分，然可惜嘉永七年 / 安政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部分闕如，無法確認《謹堂日誌》中是否有羅存德及其所呈書目的相關記錄。

[12] 關於羅存德帶入本為與《俗語解》一樣的、只有漢字的抄本的可能性，筆者認為應當不大。如後所述，《俗語解》中的閱讀痕跡顯示，其閱讀者將之與英文版的《詞彙集》相互對照使用，並可能以之學習英文。又江戶時代的文獻中，筆者所見亦無其他《詞彙集》的舶來記錄。時人所見的英文版《詞彙集》極有可能即羅存德帶入的此本。

2.2.2 傳入日本的可能原因

然而，在粵英辭書史上，《詞彙集》實非具有創新性或代表性的文獻。在《詞彙集》之前，已經存在與之形式類似的粵英對照例句集。早在 1928 年，馬禮遜（Robert Marrison, 1782–1834）就已經出版了《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此外，《詞彙集》中的羅馬化方案[13]，沒有聲調標記、不區分送氣與否，較之出版於 1841 年、更早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廣東方言中文文選》（*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區分聲調、送氣與否的羅馬化方案可謂有所退步。又有部分拼寫較為冗雜，甚至使用連接符，例如「上」*shay-ung*、「艇」*te-ang*、「脆」*tsoo-e*（對比《廣東省土話字彙》的對三字的注音分別為「上」sheong、「艇」teng、「脆」ts'ui），不可謂成熟。而這套較難理解的羅馬化方案，除邦尼本人的著作之外，筆者並未見到於任何同時期的出版物中的用例[14]。

此外，《詞彙集》的印刷量、傳播範圍，從現存藏本的數量來看或許並不大。筆者僅確認到東洋文庫（索書號：III-12-G-69、扉頁有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藏書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PL1735.B677 1854）、澳門大學圖書館（PL 1735 Bon 2010）、哈佛燕京圖書館（PL1735.B66.1854X）及史丹佛大學（495.182.B717）等五種藏本[15]。

那麼，《詞彙集》這樣一本並不出眾的作品，何以渡海來到日本、成為《俗語解》的底本呢？只是時間上的偶然嗎？誠如羅存德所言，他贈送這些書是作為學習英文的材料，以便日本能夠順利地接應將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洋列強的沓來。確實有一定可能《詞彙集》僅僅是作為前年最新出版的英漢（英粵）例句集而被贈送給日本方面。但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史丹佛大學藏本中保留的大量閱讀筆跡[16]，暗示著《詞彙集》傳入日本的原因可能有另外的答案。

該本扉頁上署有「J. C. Nevin」的簽名，可知當為長老會傳教士呢雲（Joseph C. Nevin, 1835–1913）的舊藏本。值得關注的是，卷末附有題為「List of the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receding printed pages, arranged alphabets（此前印刷部分不同漢字的列表，字母順）」的手稿，是為呢雲將正文中出現的所有漢字依邦尼的羅馬化方案所整理出的同音字表，從中可鑒其閱讀《詞彙集》之精細。他甚至還補充了 700 餘條例句（其中多數與傳教相關，如「勸你列公早日悔改」等），並附上對應英譯、依邦尼羅馬化方案拼寫的粵語音，寫在紙片上插到對應單詞所在書頁中。正文最後，呢雲寫有「Oct. 10, 1857 – Finished morning reading of Phrase Book（1857 年 10 月 10 日，《詞彙集》晨讀完成）」的讀書記錄。據 Wylie(1867:260)，此後不久的 1860 年，呢雲便前往廣州傳教。呢雲或許是利用了《詞彙集》來學習粵語，以為其之後於廣東地區的傳教活動做準備。

呢雲一例，似乎透露出《詞彙集》閱讀史的冰山一角。儘管或有例證不足之嫌，我們可以由之窺知：《詞彙集》確實被一些傳教士接受，並作為學習粵語的教材閱讀。《詞彙集》能夠經由羅存德之手進入日本，或許也是因為羅存德曾經實際閱讀、利用過此書。

要之，《詞彙集》何以被羅存德選中並帶入日本，儘管尚有商榷之餘地，從少數史料中留存的信息來推測，或許是未被記錄下來的、在傳教士中的流行與傳播所致的應然，又或許是黑船來航、東亞海洋上的波瀾造就的實然。

---

[13] 《詞彙集》開卷有「Key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漢字發音要領）」一篇關於其羅馬化方案的簡單說明，然其中並無關於音節結構、連字符等的介紹。又據筆者粗疏的觀察，其中反映的音系與同一時期的傳教士文獻所記音差距應當不很大（例如有維持精照對立的特徵等）。具體音系有待進一步考察。

[14] 例如邦尼的遊記《廣東至漢口陸路》（*Canton to Hankow Overland*, 1861）中的地名亦採用這一羅馬化方案拼寫。

[15] 此外，竹越（2013）還報告紐約公立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與神戶松蔭女子學院大學有藏本。前者筆者未能確認。後者筆者曾請求閱覽，然該館稱目前無法確認到此書的所在。

[16] 史丹佛大學藏本亦可透過 Google 圖書確認（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Dn0KAAAAIAAJ

3.《廣東省城俗語解》的閱讀者與解讀方法

3.1 從傳統漢文到粵語：《俗語解》中的訓讀法

傳入日本之後，《詞彙集》中的漢字部分被單獨謄抄出來，《俗語解》的正文部分是以生成。《俗語解》的謄抄內容基本與原文相符，僅見部分誤字。例如，或因謄寫者不識方言字之故，原文中所有的「冇」（沒有）皆被誤抄作「有」。抄寫者沒有留下姓名，單是透過文本或字跡難以推斷抄寫者的身份[17]。

但《俗語解》的文本，除了謄寫者之外，更大程度上是由使《俗語解》區別於純粹《詞彙集》覆寫本、留下大量訓點等閱讀痕跡[18]的閱讀、訓點者（以下統稱「閱讀者」）所生成。以下，回到寫本，檢視《俗語解》中的蛛絲馬跡，以試圖理解《俗語解》訓點者解讀粵文的方式，並進一步還原《俗語解》寫本可能的閱讀者的身份與形象。

3.1.1 漢文訓讀經驗的遷移

一如前述，除去正文外，寫本《俗語解》中還保留有大量的閱讀痕跡。其中最為多數、且反映閱讀者思考特質的，便是附於粵文正文、用於漢文訓讀的返點、送假名、注音假名（振り假名）[19]等。本節首先以這些訓讀記號為切入，探討閱讀者解讀粵文的基本路徑。

縱觀寫本全體，閱讀者的施訓方式與傳統漢文的訓讀方式基本相通。其中還可見一些與近世白話[20]訓讀一致的例子。例如「了」[21]字往往與前面的動詞以豎點連接，被視作一個片語，如「貓捉-了ス二一-隻ノ老-鼠ヲ一」（6a）。類似的訓讀法於近世白話的訓讀中可以找到用例，例如玉里本《金瓶梅》「做-了ス二第-二-房ノ娘-子ト一」（第一回 9b）等。

而如果閱讀者順利地解讀出某一方言字的意涵，則其會將其已有的訓讀知識遷移到方言字的訓讀上。例如，以《俗語解》中「嘅」（相當於近代漢語的「的」）的訓讀為例，並與江戶時代被廣泛閱讀、且已有相關整理研究的「和刻三言」中「的」的訓讀（丸井 2019:178-179）[22]為對照：

①構成「嘅」字短語修飾名詞

(1) 四-海嘅〈ノ〉人（9a）

(2) 醫二-好ス佢嘅〈ガ〉眼一（10a，醫好了他的眼睛）

(3) 好-多ノ使-用嘅〈スル〉人（26a，很多被僱傭的人／訓：很多使用的人）

(4) 欺-偏-嘅ノ人（6b，騙子）

Cf. 熱-鬧-的ノ所-在（「唐解元」4a）

②構成「嘅」字短語代替名詞

(5) 自-己買フ嘅（4a）

(6) 有レ罪嘅（9b）

Cf. 有ル二勢-力一的不レ做二好事一（「王安石」1b）

---

[17] 《俗語解》中正文部分字形與同時期日本寫本習慣較接近，如「兩、樣、州」作「両、様、刈」等。

[18] 本文使用「閱讀痕跡」來大致對應日本書誌學中常用的「書入れ」或英文的「marginalia」這一概念，來指代正文之外由讀者所書寫的各種內容。

[19] 限於版面配置，本文使用角括號〈〉標記原文標在漢字右側的注音假名。

[20] 本文如無特別說明或限定，「白話」指唐宋以來基於北方方言口語形成的書面文體，以區別於「粵文（粵語白話文）」。

[21] 現代粵語通常使用「咗」，然該用法或產生於 19 世紀中後期，《俗語解》中全用「了」。

[22] 引文與丸井（2019）同依尾形（1976）所附影印本。「唐解元」＝《小說奇言》（1753、岡白駒訓點）卷一〈唐解元玩世出奇〉、「王安石」＝《小說粹言》（1758、澤田一齋訓點）卷一〈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和刻三言」訓讀中有區分音合符（靠右、本文翻刻為靠上的「-」）與訓合符（中間靠左、本文翻刻為靠下方的「_」）。而《俗語解》中豎點位置皆不甚固定，應當未區分兩者。

③用於文末表示肯定、強調等語氣

(7) 個-個都做シ得嘅（2a，誰都能做的）

(8) 個-的我ガ地先-日有嘅（31b，這些我們原先有的）

Cf. 香-燭之_類モ也タ要スルレ備ンヲ的（「唐解元」3b）

(9) 呢-部ノ書在ニ邊-處_印嘅〈セシナリ〉（32a，這本書在哪裡印的）

Cf. 幾-時ヨリ放_-下スル書本ヲ的ゾ（「唐解元」6b、ゾ≒ナリ）

①中的「嘅」(1)(2)表示從屬，《俗語解》的閱讀者通常訓作「ノ」，而在人稱代詞「我」「你」「佢」（他）之後則通常訓作「ガ」，二者皆表示所屬。(3)(4)「嘅」字前的成分非名詞，閱讀者或將「嘅」訓為「スル」（連體形），以表示其為修飾名詞之成分；或將「嘅」字與前面的成分透過豎點聯結而使之片語化，再在後邊添入助詞「ノ」，這一做法在「和刻三言」中可以找到同樣的例句。②中以「嘅」結尾構成名詞句時，通常如(5)(6)不加訓點，而前面的動詞或標注為連體形，這亦與「和刻三言」中對「的」的處理如出一轍。③中置於句尾的「嘅」通常如(7)(8)不加訓點。而有一例較為特殊的(9)，或許是因為在疑問句結尾，「嘅」被訓讀作「セシナリ」。儘管兩者形式不同，但都亦能在「和刻三言」中找到類似的訓讀形式。由此可見，閱讀者在訓讀「嘅」的時候，將其已知知識內與之對應、常見於白話訓讀中的「的」字的訓讀方法遷移到其上。除此之外，「佢」（他）「乜」（什麼）等方言字，在文本當中也被以同樣的方式，獲得了「其」「何」等傳統漢文訓讀形式的遷移。

3.1.2 訓讀經驗遷移的問題

然而，將漢文訓讀的經驗遷移入粵文的閱讀，未必能得到正確的結果。例如，對粵語方言字「咁」，《俗語解》大多將其訓作「カクノコトキ・ク・シ」[23]：

(1) 咁〈カクノコトキ〉モ亦好（1b，這樣也好）

(2) 我信咁〈カクノ如シ〉（3b，我相信是這樣的）

(3) 呢-件ノ事唔係ニ咁〈トク〉做_（5a，這件事不是這樣做的）

(4) 先-時一-樣咁〈カクノコトク〉好（3b，跟先前一樣好）

(5) 可レ惜費-了ニ咁-多〈イクタ〉ノ心-機_（1b，可惜費了這麼多的精力）

(6) 貓咁〈カクノ如ク〉大（6a，跟貓一樣大／訓：貓這般大）

閱讀者這樣的訓讀方式，似乎是將「咁」直接等價替換為傳統漢文與白話文本中「如此」或「這般」。「咁多」（如此多）一詞較為特殊，或因在《俗語解》中出現頻率相當之高，閱讀者往往將其片語化處理，訓讀為「イクタ」（對應「幾多」的訓讀），如(5)。然而，《俗語解》中的「咁」除了「如此」的用法外，還有表示「一般、同樣」的用法。但《俗語解》的閱讀者並未意識到這一詞的多義性，僅僅是將「如此」的用法延伸開去，使得出現了(6)這樣錯誤的理解。

而另一種遷移導致理解偏差的形式，則是一種「望文生義」。例如，《俗語解》中表示「些、們」之意的「的」，（今日通行的粵文中一般寫作「啲」或「D」），被《俗語解》的訓點者直接以常見於近世白話訓讀中「的」字的訓讀法套用於其上[24]：

---

[23] 此外，還有相當少量的「咁」旁標注「コノ」，如「呢-處有リ三你カ下ニ耙ヲ咁〈コノ〉深-水_」（6b，這裡水有到你下巴那麼深／訓讀義不明）。

[24] 但閱讀者可能意識到了「的」不同於明清白話作品中的「的」。部分「的」僅與前字相連而無特別標示假名，反映出閱讀者可能對「的」字意義產生了疑惑與思考。

(1) 八-點鬆ナル的（1a，八點過一點／訓讀似乎將「鬆」作形容詞解，不明）
(2) 或者八-點過ル的（30a，可能八點多一點／訓：或者八點過的）
(3) 煮レ飯早的〈シ〉（33a，早些煮飯／訓：煮飯早的）

以上(1)(2)(3)中的「的」都為「一些」之意，然《俗語解》中的訓點則與上述「和刻三言」中「的」的用法類似。例如(1)，「的」字之前「鬆」字下，標注有連體形的「ナル」，與「和刻三言」中構成代替名詞的「的」字短語中的訓讀一致；(2)(3)中的「的」則未被施加訓點，與「和刻三言」中用於文末表示某種語氣的「的」字呈現同樣的形式。

然而，將其既有漢文知識中「的」字的意涵錯誤地類推至表示「一些」的方言字「的」上，還可能與《詞彙集》中所收例句的性質有關。前述史丹佛大學所藏本中，呢雲在扉頁背面貼有一張便簽，或用於記錄其閱讀《詞彙集》時所需要注意的問題。其中就提到兩點：

2. Is it colloquial language? （其是否為口語的表達？）
3. Is it daily Dialect? （其是否為日常的方言？）

呢雲的筆記提醒我們：《詞彙集》實際並非如其書名所示，僅收集口語表達，其中還混入了非日常、非口語的表達。一方面，語體的多元性使得同一個意思可能存在語體不同的兩種表達，例如：《詞彙集》例句中同時存在口語程度較低的「不可」（如「不可隨口應人嘯」（p.136，不可以隨便答應人））與較高的「唔好」（如「唔好反口齒」（p.136，不可以不守承諾））兩種形式表示禁止。而另一方面，同一個形式的字，則在不同語體類型文本中可能表達不同的意涵。例如，「的」字在《詞彙集》中，除了通常用於表達「一些」外，確實存在與白話文獻中同樣的用法：

(1)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your shop, 難尋你的舖 *nán tsum nee tee pō*. (p.157)
難レ尋你的〈ノ〉舖（37a）
(2) Where is my hat? 我的帽在邊處 *ngaw tee mō tsoy peen chü*. (p.82)
我-的カ帽ハ在二邊-處一（37a，我的帽子在哪裡）[25]
(3) Picked in the flower garden, 花園摘的 *fá ün chák tee*. (p.128)
花-園ニ摘〈スル〉的（30b）

以上(1)(2)中的「你的」「我的」構成修飾成分，(3)中的「花園摘的」構成「的」字短語，閱讀者將白話訓讀中「的」的訓讀模式遷移到其上，在這些例句中作出了正確的解讀。然而，《俗語解》的閱讀者沒有注意到在不同文體中，「的」字雖然字形相同，但卻表示不一樣的意涵，從而錯誤地將類似白話表達的「的」字用法，遷移到了口語體例句中表達「一些」的「的」字上。

3.1.3 方言字詞的理解與遷移的壁壘

在遇到特殊的方言字詞時，還會出現訓讀知識遷移的壁壘。例如：

(1) 而カ家ニ去（18b，現在去／訓：去你家）

[25] 以上(1)(2)若無英文參照，按現代粵語語法則有可能解讀為「你的一些舖」、「我的一些帽子」，即「的」亦可以作為「些」意解。然對應英文中「shop」「hat」皆為單數。又檢索香港科技大學「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所收錄 19 世紀語料中似乎鮮見上述現代粵語的用法。由此，可以推斷此處的「的」當即為構成修飾名詞成分的「的」。

(2) 好-口-鉗〈クチノヨクアフクキヌキ〉(32a，清楚的發音／訓：合適的鐵撬)
(3) 點レ燈落-去瞓〈オシユ〉(24b，開燈下去睡／訓意不明)
(4) 你思-慮太-過點〈ウタヽ〉能成レ事(2a，你想太多，怎能辦成事呢／訓意不明)

(1)中的方言詞「而家」(現在)被閱讀者逐字拆分為第二人稱代詞「而」與名詞「家」；(2)中的方言詞「口鉗」(發音)也同樣被逐字拆分，儘管拆分理解之後的結果似乎閱讀者也無法講通。(3)中的方言字「瞓」(睡覺)則被拋去部首作「訓」字理解。(4)中的方言字「點」則或許被替代成日語音讀中同音的「轉」字理解，可能被理解為「十分、更加」。要之，各例中閱讀者儘管都未能正確地理解其中方言字詞的意思，但仍然努力試圖透過拆分詞語、尋找形近或音近的字來解讀，而其遷移漢文訓讀知識的思路亦貫徹其中。

而方言字詞中或許最令閱讀者困惑的，當屬「唔」(相當於「不」)字。如前所舉「咁」字等例，閱讀者可能存在將粵文中的方言字詞以其比較熟悉的、且相對固定的傳統漢文或白話文本中語詞等價置換的思維模式。然而，就筆者所見，《俗語解》中的「唔」存在至少以下幾種訓讀形式(以下各例訓讀意無法確定)：

①マコトニ(＝誠)
(1) 個-個都知-到唔〈マコトニ〉好シ(23a，什麼都知道不好)
(2) 出-去出-去唔〈マコトニ〉好-睇(3a，出去、出去，沒什麼好看的！)
②ナンゾ(＝何)
(3) 有レ篷唔〈ナンゾ〉怕(2a，有篷就沒什麼怕的)
(4) 唔〈ソ〉曾出-來(7b，不曾出來過)
③アニ(ン)(＝豈)
(5) 我ガ地學二你-地ノ話一唔〈アニ〉學得到ン(24a，我們學你們的話學不會)
(6) 來ル唔ニ曾セン(7b，來了沒有)
④ン(勸誘？推量(反語)？)
(7) 唔俾ンニレ人行カ一(1b，不讓人過)
(8) 你唔~~〈アニ〉~~信ニ問-過センニ佢ヲ一(3a，你不信的話就問他)
(9) 唔~~〈アニ〉~~好シテ怪-責センニ佢ヲ一(6a，不要責怪他)
⑤無訓讀
(10) 唔聰得多シ(32a，賺得不多)

其中，①至③分別對應「誠」、「何」(反問)、「豈」的常用訓讀。可見閱讀者儘管並不理解「唔」字的意義，然仍然在漢文訓讀經驗中尋找可能的答案。④的「ン」不能明確其意涵，可能表示反語、勸誘等。惟如上所舉④中，(7)至(9)的「唔」出現在句首或「你」後，其後接述賓短語，閱讀者或許將「唔」理解為了祈使句的句首標誌。以上①至④，儘管都為「唔」填入了一個可能的答案，但其「多元性」本身便反映出閱讀者的躊躇。如(8)(9)兩例，甚至用胡粉覆蓋原本寫在「唔」旁的注音假名上，以修改訓讀。又如⑤這樣「交白卷」的例子亦不在少數。由此可見，面對方言字「唔」，我們的閱讀者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總結本節的分析，寫本《俗語解》的閱讀者似乎建立了一個粵文的語詞到已知的漢文語詞的映射。具體而言：若是某一粵文的語詞 A 與其已知的漢文語詞 A'形式相同(如「了」，又如粵文的「的」與白話中的「的」)，則直接將其知悉的 A'的訓讀方式轉接到 A 上。而若某一語詞 B 不見於白話(如粵文中的「嘅」)，則在其相對熟悉的傳統漢文或白話中尋找可以等價替換的語詞 C(如白話中的「的」)，再將 C 的訓讀方式嫁接到這一粵文中的新語詞 B 上。閱讀者設想每一個粵文的語詞，都能在已有的漢文知識中找到、且固定於盡量少數的對

應語詞。透過這一映射，閱讀者實現了既有知識（傳統漢文文本、包括白話文學的閱讀經驗）到新的粵文文本的遷移——儘管這一遷移並不十分完美，甚至漏洞百出。一如前述，既有因未能識破《俗語解》中包含多種語體的文本而產生的錯誤，又有因遇到難解的粵語方言字而臆斷其義、猶豫不決的例子。

3.2 從蘭學到英學：《俗語解》閱讀者的知識與轉向

3.2.1 閱讀者的蘭學知識

如前所述，閱讀者在遇到方言字時往往碰壁。然而，一些方言字卻成功地被閱讀者理解，並以注音假名的形式清楚地標在旁邊：

(1) 聽〈モーケ〉得少（32a，賺得少）
(2) 拈-來睇〈ミル〉（4b，拿來看）
(3) 你有二乜〈ナニ〉-事一（4b，你有什麼事）
(4) 個〈コノ〉人實-首易レ請（1a，這個人非常熱情）
(5) 佢〈カノ〉老-頭住-在二廈-門一（1b，他的爸爸住在廈門）
(6) 有レ粗〈アラキ〉有レ幼〈コマカキ〉（7a，（布）有粗有細）

以上數例中的方言字，包括 3.1.1 所舉例子中的「嘅」，皆被正確地解讀出來。誠然，譬如「睇」字也或許可以利用部首、「幼」可以作為「粗」的反義詞被猜出來。又例如「乜」「個」「佢」等詞出現的頻度相當高，閱讀者確實有可能根據前後的文義猜出方言字字義。但一如前述，即使是出現頻度極高的「唔」也未被理解出來。閱讀者解讀粵文，多少程度上依靠上下文本實當存疑。那麼，閱讀者解讀這些文字的依據，或許還有其他可能嗎？

《俗語解》中訓讀記號之外的一些其他閱讀痕跡，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從筆跡等來看，這些痕跡與訓讀記號當為同一人（即閱讀者）所留下。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對應原書中分頁的位置，寫本《俗語解》中會用紅色實心圓標記，並在旁邊用阿拉伯數字標示頁碼；原書中的詞目則以黑邊空心圓的方式標示。此外，正文的抄寫者將《詞彙集》原書最後所附勘誤部分「Corrections」（p.214-216）中的漢字謄抄於《俗語解》後，其旁有閱讀者以朱筆書寫的「以下校正誤字非語解宜去」一句。這些現象暗示著：閱讀者在閱讀寫本《俗語解》的同時，應當還在與《詞彙集》原書相互對照。

可惜的是，這位閱讀者的英文閱讀能力應當並不高，否則其解讀粵文也不至於出現上述如此多的錯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將一部分英文以朱墨或轉寫為片假名、或原樣趁錄到《俗語解》上。但其中的片假名的轉寫大多並不符合英文的讀音：

(1) 個-箇唔-係個-箇係二伙-記一〈イト・イス・ノト・タト・オネ・タト・オネ・イス・ア・バルトネル〉（30b，不是這位，這位是夥計）
    It is not that one, that one is a partner, 個箇唔係個箇係伙記（p.126，羅馬化略）
(2) 或者來〈ペラプス・イ・ウィッル・コメ〉（30b，可能來）
    Perhaps I will come, 或者來 *wák chay loy*.（p.127）
(3) 批皮〈ペアルト〉（30b，去皮）
    PEAL, to 批皮 *pī pee*.（p.127）
(4) 忍-耐〈パチーント〉（30b，圖 2-1 中第三行）
    PATIENT, 忍耐 *yun noy*.（p.126）

由上可見，閱讀者的轉寫大多將每個單字拆分為子音與母音組合，每一個子音母音組合對應

一個假名，後方無母音的子音字母則單獨對應一個假名。然而，這種轉寫方式所表示的讀音，與英語實際的讀音全然不符。又由例(3)可見，《詞彙集》中動詞作為詞目時，往往將不定式結構中的 to 放置在動詞後。而閱讀者或因無法理解，而只是機械地以片假名形式轉寫英文字符，未將 to 調至前方、甚至未加「・」以示區隔。

但其轉寫中存在兩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其一、子音後的 h 不被轉寫（如(2)中「rha」被轉寫為「ラ」）；其二、「ie」並非轉寫為兩個母音，而是 i 的長音（如(4)中「tie」被轉寫為「チー」）。事實上，《詞彙集》傳入日本正處幕末初期，蘭學仍然盛行。閱讀者所依照的，或許是當時轉寫荷蘭文的規則。以箕作阮甫（1799–1863）所編荷蘭文詞典《改正增補蠻語箋》（1848，以下略稱「蠻語箋」）為例，其中「樂德　rhodus」（羅德島）被轉寫為「ロデュス」（卷二附 5b）、「水岐〈カハノマタ〉　rivierarm」（河汊）被轉寫為「リフィールアルム」（卷一 6b）；其轉寫與《俗語解》中所見的轉寫方式契合。

除此以外，直接抄錄英文的部分，其字形亦有特殊之處：「u」「y」兩個字符全部寫作「*ú*」「*ÿ*」（如「長命」左側抄有「*longevitÿ*」（25a，圖 2-2）、「靈魂」左側抄有「*soúl*」（38b）等）。這一寫法常見於 19 世紀前的荷蘭文手寫體中，《蠻語箋》不僅正文部分皆使用這一寫法，在卷首的字母表中這兩個字母也以「*ú*」「*ÿ*」的形式出現（卷一 2a）。以上的信息歸結於這樣一條結論：這位閱讀者應當是一個具有荷蘭文閱讀與書寫能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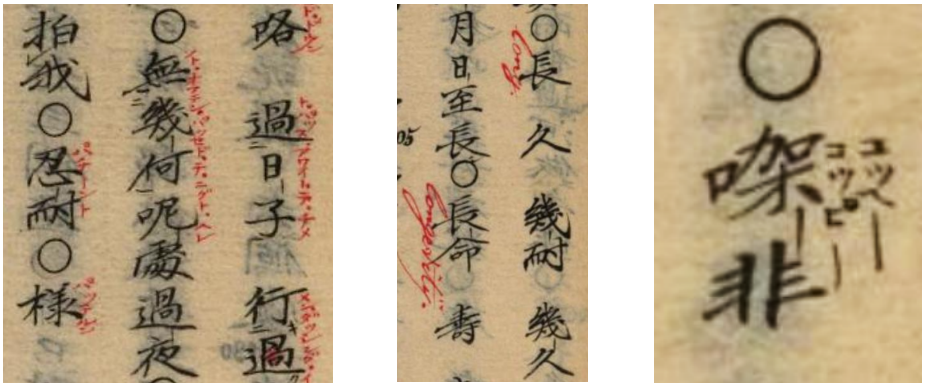

圖 2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媒體中心藏《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請求記號：68@20@1）
（左起：圖 2-1：30a 部分；圖 2-2：25a 部分；圖 2-3：7b 部分）

那麼，閱讀者將英文轉寫出來的目的又何在呢？我們看到較為特殊的一處：

> 喫–非〈コッヘー・コッピー〉（7b，圖 2-3）
> COFFEE 喫非 *ká fee*（p.29）

閱讀者在這裡標注完英文「coffee」的轉寫「コッヘー」後，在右側又寫上了應當是荷蘭語「koffie」的轉寫「コッピー」。由此一例，筆者推測：閱讀者或許試圖在荷蘭語中尋找轉寫接近的單詞，以識讀其不甚了解的英文。而這或許亦是其能夠識別出上述一些方言字的原因。又如上述「乜」「幼」二例：

(1)　What business have you? 你有乜事　*nee yow nut suz*. (p. 17)
(2)　Have both coarse and fine, 有粗有幼　*yow tsō yow yow*. (p. 28)
　　Cf. 箕作阮甫《改正增補蠻語箋》
　　君ガ所レ欲スル何ニ事ソ　*wat*〈ワット〉 *wilt gÿ hebben?*（卷二 26b）

細〈コマカキ〉　*fyn*〈フェイン〉（卷二 3a）

以上兩句中的方言字所對應的英文，皆可以在《蠻語箋》中找到轉寫類似的單詞。閱讀者能夠將「乜」「幼」明確地對應到「何」「細」，或許正是因為利用其荷蘭語的知識，識讀出了英文的「what」與「fine（纖細的）」。除此之外，前述的「睇」「個」「佢」在《詞彙集》中所對應的英文「see」「that」「he」（如 p.16, 1,25），於《蠻語箋》之中皆能找到轉寫相似的同義詞形「zie」「dat」「hÿ」（如卷二 40a, 30a, 32b）。閱讀者或許運用了這一種對應關係，將其所不認識的粵語方言字，轉化為了荷蘭語辭書中的漢文，從而可以完成其訓讀知識的遷移、進一步實現其訓釋。

當然，這種轉化的實現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如前所述，「唔」所對應的「not」，在《蠻語箋》中亦有頻繁出現且相對義同形近的「niet」一詞；閱讀者無法解讀出這一單字，屬實令筆者不解。如前所述，閱讀者或許其實並無真正的閱讀英文的能力，其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調動自己的荷蘭文知識、利用這些英文，仍然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3.2.2　可能的閱讀者與英學轉向

本節至此，基於對《俗語解》中所保留閱讀痕跡的分析，似乎可以描繪出這樣一個閱讀者的形象：其具有傳統漢文訓讀與白話文本的經驗與知識，能夠將已知的訓讀知識遷移至粵文上；還擁有蘭學背景，能夠書寫荷蘭文的拉丁字母跟阿拉伯數字等，也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荷蘭語的單詞。那麼，這位閱讀者究竟可能是誰呢？

有趣的是，在古賀謹一郎周邊人物的記錄中，筆者發現了幾位可能的《俗語解》閱讀者。時間是安政三年（1856）十月十日，《詞彙集》傳入日本近兩年之後：

> 晩に高畠に適く。（中略）高畠、杉浦等と廣東省城俗語を見る。其俗語解し難きもの多し。（中略）今宵此に高畠と同衾す。（田中 1996:316）
> （夜晚，往高畠（五郎）家……與高畠、杉浦（磯吉）同觀《廣東省城俗語》。其俗語多有難解之處。……是夜與高畠同衾。）

這筆記錄出自柴田收藏（1820–1859）的日記。據成田（1971），收藏出生於佐渡島，幼年在村內修習儒學，成年後則志存蘭學、尤其是其醫學，曾經屢次到訪江戶。弘化元年（1842），收藏進入蘭學大家伊東玄朴（1800–1871）的蘭學塾，進行「蘭學修行」。嘉永三年（1850），收藏經蘭學塾塾頭池田洞雲的介紹，接觸到當時在江戶的古賀謹一郎。此後，收藏與謹一郎兩人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收藏頻繁地出入於謹一郎門下，並得以借閱謹一郎所藏的書籍。

而與收藏一同閱讀的高畠五郎（1825–1884）也有著與收藏類似的經歷。高畠五郎嘉永元年曾於大阪求學於儒學者齋藤五郎門下，次年則成為收藏所在的伊東蘭學塾的一員。高畠與謹一郎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嘉永六年曾隨同謹一郎前往長崎處理俄國艦隊來航問題[26]。

三人似乎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繫。在收藏的日記中，多有三人相互議論書物的場面，也曾有共同訪問謹一郎的記錄（田中 1996:260）。他們蘭學、儒學兼通的知識背景，與前面基於文本分析所設想的閱讀者形象相契合。而從三人與謹一郎的交往來看，或許便是經由謹一郎，從而接觸到這本安政元年所接收、羅存德所帶來的《詞彙集》。《俗語解》中所留存的或許正是他們所留下的閱讀痕跡。

收藏的這一條日記，正是記於蕃書調所成立當年的春天。是年，幕府將原本為應對日漸增加的國際事務所設、負責外國圖籍文書翻譯的「洋學所」改組為「蕃書調所」，謹一郎任

[26] 惟關於杉浦磯吉，筆者不查其較早時期的相關記錄。

頭取。在正月公佈的蕃書調所教授手傳與書物出役的候補名單中，分別可見高畠與杉浦的姓名[27]。十二月，收藏也受到謹一郎的重用，作為地理學者出任調所掌圖役。

儘管當時蕃書調所的翻譯事務主要仍集中於荷蘭語，然而受到培里艦隊來航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英文也逐漸在蘭學者中被重視起來（茂住 1983:105）。活躍於幕末至明治時代的思想家西周（1829–1897），便在自傳中記錄（大久保 1966:734）：安政三年冬，他曾與中濱萬太郎閱讀英文，著力於英荷、荷英詞典的讀解。次年初，西周又與箕作阮甫同講英書。由西周一例一例足以窺見，安政初期從蘭學到英學的轉向已經悄然發生。

考慮到這樣的時代背景，三人閱讀《俗語解》（或《詞彙集》）的目的，或許也正是在於初步地學習英文、英學。由《俗語解》中閱讀痕跡來看，閱讀者或確有以之學習英文的意圖。閱讀者儘管透過荷蘭文與英文的像似性解決了一些方言字的問題，但總體而言其英文應當尚未入門。從在單詞旁邊標注英文、在《俗語解》中標注對應原書頁碼的行為來看，其對《俗語解》全卷施加訓讀的目的，或許在於以便將之作為檢索、閱讀《詞彙集》時放在手邊的訓譯手冊，並進一步將《詞彙集》作為英文學習材料活用——正如 2.2 中羅存德所設想的那樣。

然而，關於三人的《俗語解》閱讀，筆者能獲得的資訊幾乎止步於此。現存的柴田收藏日記於不久後的安政三年除夕夜戛然而止。安政六年四月，收藏於江戶去世。在《俗語解》中留下痕跡的閱讀者是否果真是收藏、高畠或是杉浦中的一位，囿於史料已然無法確認，但或許正如魚返（1943:18）所言：「（前略）處々朱字で英語ははいつてゐることです。當時蘭學から英語へ轉向してゐた名殘りでせう（散在有朱筆所寫的英文。這或許是當時蘭學向英學轉向的餘波）」。這一年末，堀達之助經過謹一郎的斡旋出獄並進入蕃書調所任調所翻譯方，並於次年（萬延元年＝1860）末出任蕃書調所教授手傳出役、負責英語教育。文久二年（1862），堀達之助出版《英和對譯袖珍辭書》，是為最早印刷出版的日英辭書（庭野 2008:26）。《俗語解》中的各種閱讀痕跡，或許正是英學時代浪潮襲來時，試圖透過閱讀英粵辭書、爭作弄潮遊的知識人群體的一幀縮影。

3.3 《俗語解》之後：幕末明治期與粵語的際遇

儘管前面討論了可能的閱讀者，但事實上並無決定性的證據支持《俗語解》中的筆跡生成於安政前後。故作為補充，仍然有必要探討《俗語解》寫本中的閱讀痕跡成立時間的下限，並兼以概觀安政之後至於明治初年，日本人與粵文的幾次接觸。

萬治元年（1860），學習了數月英文的福澤諭吉（1835–1901），在舊金山購入了「子卿」所著的粵英對照詞彙例句集《華英通語》（咸豐五年＝1855），並以此為基礎改造後出版了《增訂華英通語》，是為日本最早的有粵文的出版物。然如福澤在序中所言，「其所譯皆用國字，故學者自非諳支那音者，則縱令解其義，弗能識其音也」（1b），識理粵文、尤其是其中的方言字對於時人而言仍然並非易事。

日本人真正能夠較大程度理解粵文與粵語方言字，或不早於明治初年。1870 年（明治三年），柳澤信大（1837–1898）出版《粵東俗字便蒙解》。據高田（2009:8），柳澤本身對英文書籍的出版抱有興趣，在此書出版前後，他還將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1844）以及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1869）的正文訓譯，以《英華字彙》（1869）和《英華和譯字典》（1879）的名義出版。而此書，也是基於廣東人鄺其照（1836–?）所編漢英辭書《字典集成》初版（1868）附錄中的〈粵東俗字註解〉一篇整理翻譯而成。由於《字典集成》正文中出現了較多的粵文特殊的語詞，鄺氏於該篇中用通用語對這些語詞作了解釋。

柳澤的《粵東俗字便蒙解》並非〈粵東俗字註解〉的單純訓譯本，其對原文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調整與補充。原本按照正文中出現順序排列的粵語用詞，被柳澤按照文法性質劃分為

[27] 參見《蕃書調所立合御用留》37b、41b 的記錄。

「實字第一」（名詞）、「生字第二」（動詞）、「虛字第三」（虛詞、形容詞等）重新排列。甚至給〈粵東俗字註解〉中原本沒有例句的一部分單詞，也從《字典集成》正文等中選取例句補入，並附上翻譯（馬 2010:91）。其中便收錄了「的」「唔」等《俗語解》的閱讀者未能理解的單字。

> (1) 的　些〈スコ〉シナリ快的ト云フ如シ即チ些シ快キナリ快的着二衣服一〈チツトハヤクキモノヲキレヨ〉（7b，些也。如云「快的」即「稍稍快一點」。「快的著衣服」、稍微快點穿衣服。）
> (2) 唔　不〈アラ〉ズナリ唔着ノ如シ即チ不レ合〈アハヌ〉也（7b，不也。如「唔著」即「不合」（不對）之意。）

對比在〈粵東俗字註解〉原文中，兩字作「的，些也。如快的，即快些也」「唔，不也」（p.2，内田、沈 2016:124 上欄）。可見柳澤已經能夠藉助鄺其照的注解，理解這些粵語方言字的意義了。儘管目前無法明確《粵東俗字便蒙解》在何種範圍內傳播，但恐怕《俗語解》中訓釋的成立時間不會太晚於明治初年。

值得注意的是，《俗語解》中所能見到的訓讀粵文的方式，在《粵東俗字便蒙解》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餘波。例如上舉例(1)中的「快的着二衣服一」，又如「着唔レ着（對不對）」「冇レ耐（不久）」（8a），「唔」「冇」也似乎被代換上了「不」的訓讀。然而，柳澤並未將所有的例句訓讀，更多地採取了直接在旁邊以注音假名的形式，用較為口語化的語言來直接翻譯粵文。進入明治以後，或因日本與廣東地區往來日漸密切，訓讀粵文也就淡出了歷史的舞台。

4. 結語

以上，我們探討了邦尼的《詞彙集》從 1854 年在廣州出版，到 1855 年由羅存德作為英文學習資料攜來上田、爾後進入了諸如古賀謹一郎、柴田收藏等幕末日本知識階層視野的前後始末。在蘭學向英學轉變的風向中，《詞彙集》作為較早輸入日本的近代英漢辭書類的一種，被閱讀、被學習，成為推波助瀾的一股力量。

與其他被帶入日本的英漢、漢英字典不同，其中所刊載的粵文，也成為了幕末的知識階層好奇的對象。《俗語解》的閱讀者，儘管身份不明，或許可以說是《詞彙集》的讀者中最熱忱的一位。透過《俗語解》中留存的大量閱讀痕跡，可以看到閱讀者展現出的對其中的粵文極大的好奇與關心。儘管處處充滿疑惑，他似乎調動了自己的渾身解數，調用自己閱讀漢文、閱讀白話文學的經驗，盡力地將其透過知識的遷移，來盡可能地去解讀出從未見過的粵文，尤其是其中令人費解的方言字。甚至調動閱讀荷蘭文的知識積累，比對英文字符中可能的對應項，來破譯一些字詞。囿於史料，這位閱讀者的確切身份無從掌握，但筆者推測或許是一位如柴田收藏等人一樣，有著儒學與蘭學雙重背景的知識階層。在某一個夜晚，召集三五好友共同議論其中文字，爾後發出「好難」的歎息。

從漢文、白話到粵文，從蘭學到英學。近代史大幕掀開、多種未曾見過的語言湧來的一刻，日本知識階層的驚詫與困惑、求索的努力，透過《俗語解》寫本及其中的閱讀痕跡，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史料文獻〉

Bonney, Samuel William. 1853. *Phrases in the Canton Colloquial*, n.s.
——. 1854. *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略稱「詞彙集」）
Wylie, Alexander. 1867.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廣東省城俗語解』（寫本）. 慶應義塾圖書館三田メディアセンター藏本（請求記號：68-20-1）.（略稱「俗語解」）
『金瓶梅』（寫本）. 鹿兒島大學附屬圖書館玉里文庫藏本（請求記號：TZ4068）.
川路聖謨寫『蕃書調所立合御用留』（寫本）. 宮內廳書陵部藏マイクロ（請求記號：DIG－KSRM－287904）.
森島忠良撰・箕作阮甫補 1848（嘉永元年）.『改正增補蠻語箋』、謙塾刊行.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本，請求記號：4-81.9/ハ/1）（略稱「蠻語箋」）
福澤諭吉 1860（萬延元年）.『增訂華英通語』、快堂藏板.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藏初版，請求記號：言語 2G||104）
柳澤信大 1870（明治三年）.『粵東俗字便蒙解』、東京書林岡田屋嘉七.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請求記號：829.1-Y536e）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 1913.『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　附錄之一』、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 1916.『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　八』. 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大久保利謙編 1966.『西周全集 第 3 卷』. 東京：宗高書房.
尾形仂編 1976.『小說三言』（岡白駒、澤田一齋施訓）. 東京：ゆまに書房.
田中圭一編註 1996.『柴田收藏日記２——村の洋學者』. 東京：平凡社.
內田慶市、沈國威編 2016.《字典集成》（鄺其照）. 北京：商務印書館.

〈論著文獻〉
魚返善雄 1943.「支那語書誌學（５）—廣東語事始—」,『支那語雜誌』10 月號：18-19 頁.
天理大學中國學科研究室編 1952.『日本現存粵語研究書目（稿）』.
成田美紀子 1971.「柴田收藏について」, 田中圭一編『柴田收藏日記　下』: 333-376 頁. 佐渡（小木町）: 町史刊行委員會.
茂住實男 1983.「蕃書調所における英語教育」,『英學史研究』第 16 號：103-116 頁.
中嶋幹起 1995.「中國境域內の諸言語の記述的・文獻的研究：漢語諸方言及び滿洲語を中心として」, 東北大學博士論文.
那須雅之 1998.「『英華字典』を編んだ宣教師ロプシャイト略傳（中）」,『しにか』Vol. 10, 11 號：100-105 頁.
遠藤智夫 1999.「『英和對譯袖珍辭書』とメドハースト『英漢字典』－抽象語の譯語比較—I-Z（完結編）」,『英學史研究』第 32 號:39-51 頁.
庭野吉弘 2008.『日本英學史敍說：英語の受容から教育へ』. 東京 : 研究社.
高田時雄 2009.「清末の英語學—鄺其照とその著作—」,『東方學』第 117 輯：1-19 頁.
馬之濤 2010.「『粵東俗字便蒙解』の紹介」、『開篇』Vol.29：91 頁
竹越美奈子 2013.《早期粵語文獻目錄（稿）》（2025 年 3 月 3 日閱覽：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9103960/staff.aichi-toho.ac.jp/takekosi/mokuroku.pdf）.
丸井貴史 2019.「白話小說訓讀考—「和刻三言」の場合—」, 同氏『白話小說の時代—日本近代中期文學の研究—』: 172-199 頁. 東京：汲古書院.
片岡新、李燕萍 2022.《晚清民初歐美傳教士書寫的廣東話文獻精選》.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